

从人民观视角看民粹主义对全球治理的冲击

朱梅莹

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 民粹主义作为政治现象与社会思潮,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扩散, 其于欧美政治体系的兴起既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矛盾深化, 亦揭示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危机。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理论基础, 可剖析民粹主义本质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创造者与社会进步主体, 而民粹主义虽以“人民”为号, 实则异化人民概念, 将其工具化、情绪化以服务特定集团利益。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 分析民粹主义起源、演变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揭示其引发的政治撕裂、治理困境与思想迷雾。民粹主义以“反精英”“反全球化”为幌子, 掩盖资本主义内部分化危机, 削弱全球治理合作基础, 破坏多边主义秩序。文章提出应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重构基于人民利益与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理念, 实现公正、平等、合作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 民粹主义; 全球治理; 资本主义危机; 多边主义

The Impact of Populism on Glob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View

Zhu Meiyang

College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Jinan, China Shandong Jinan 250022

Abstract: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and social ideology, populism has spread globall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Its rise i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urope and America not only reflects the deepening contradiction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ut also reveals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people, the essence of populism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governance can be analyzed. Marxism emphasizes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creators of history and the main force of social progress. However, although populism claims to represent "the people", it actually distorts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 instrumentalizing and emotionalizing it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specific groups. This article, from a Marxist perspective, analyzes the origin, evolution of populism and its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 revealing the political divisions,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ideological confusion it has caused. Populism, under the guise of "anti-elit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 conceals the internal division crisis of capitalism, weakens the found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undermines the multilateral order.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used to reconstruct a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to achieve a new pattern of global governance that is just, equal and cooperative.

Keywords: Marxist view of the people; Populism; Global governance; Capitalist crisis; Multilateralism

0 引言

自 20 世纪末期, 全球化在技术革命与资本扩张推动下加速推进, 但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与政治异化问题随之凸显。特朗普政府的 America First 政策、英国 Brexit 运动及欧洲大陆 anti-immigration 浪潮的兴起, 使民粹主义成为影响国际政治格局与全球治理的关键变量。其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名, 实则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操控社会焦虑、削弱民主共识, 动摇全球治理制度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理论支撑, 可洞察民粹主义对“人民”的虚假代表性, 揭示其意识形态与制度层面对全球治理秩序的冲击。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强调人民主体地位与历史创造性, 主张

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现人民解放; 而民粹主义将“人民”符号化、工具化, 使之沦为权力运作手段。本文分析民粹主义思想渊源、现实表现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阐明其制度逻辑与意识形态困境, 提出基于人民主体性的全球治理重构路径。

1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民粹主义“伪人民性”的理论对比

1.1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 强调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与变革的关键力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但其行动并非随意而为。”人民是历史承载者与社会矛盾集中体现者。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真正的“人民利益”需通过阶级解放与生产关系革命实现。人民的统一非空洞政治口号，而需物质利益一致与阶级认同为基础。这一人民观揭示了人民的历史性、阶级性与现实性，反对将人民抽象化、符号化的政治操控^[1]。

1.2 民粹主义“人民观”的虚假代表性

民粹主义以“人民对抗精英”为核心，构建“纯洁人民”与“腐败精英”的二元对立，制造社会情绪动员的政治空间。Cas Mudde 提出民粹主义是“thin-centered ideology”，可与不同政治立场结合形成右翼或左翼民粹主义。其“人民”概念是政治建构的符号与情绪集合体，非现实社会主体。民粹主义以反建制、反权威为诉求，目的非重建社会公平，而是通过情感动员重新分配权力资源。其“人民观”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历史人民”存在本质分歧：前者是被操控的政治对象，后者是自觉的历史主体。

1.3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属性

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矛盾加剧。David Harvey 在《The New Imperialism》中指出，全球化是资本积累空间的扩展，非普遍繁荣的实现。社会底层在经济全球化中被边缘化，其焦虑与失落被民粹主义政治利用。民粹主义借助 anti-globalization、anti-immigration、national priority 等口号，将系统性矛盾转化为身份冲突，模糊阶级斗争界限。其本质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意识形态转移”，将结构性问题情绪化、道德化处理，为资本权力再生产提供掩护^[2]。

2 民粹主义的全球扩张与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侵蚀

2.1 民粹主义的国际蔓延与政治特征

21 世纪后，民粹主义在全球蔓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巴西等国出现多种形式的民粹政治。其共同特征为反对精英主义、multilateralism、知识权威与民族中心主义。特朗普的 America First 政策、英国 Brexit 公投及欧洲极右翼政党兴起，均表明民粹主义对传统国际秩序的挑战。民粹主义政治家通过简化问题、激化对立、煽动民族情绪赢得短期支持，但长远看破坏制度稳定与国际合作。Zygmunt Bauman 在《Liquid Fear》中指出，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引发“安全焦虑”，民粹主义正是这种社会情绪的政治表现。

2.2 民粹主义对全球治理结构的冲击

民粹主义对全球治理的冲击体现在制度层面的

multilateralism 危机、治理理念的碎片化及国际合作的信任缺失。民粹主义国家倾向于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妨碍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治理体系的运作。例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削弱全球公共事务协同能力。民粹主义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使全球治理从合作共赢转向竞争对抗，侵蚀国际秩序合法性。其通过操纵“人民主权”概念，将国际责任与义务政治化、情绪化处理，动摇国际制度的道义基础^[3]。

3 民粹主义冲击的深层逻辑与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

3.1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构性危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民粹主义兴起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度危机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导致财富与权力集中，造成劳动者相对贫困化与社会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化资本跨国流动与垄断结构，使全球南方成为廉价劳动力与资源输出地，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与中产阶级衰落。全球化带来“资本全球化”与“劳动地方化”的失衡，民粹主义在此背景下以“反全球化”“反精英”姿态出现，通过 nationalism 与 anti-immigration 话语转移矛盾焦点。但其未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本矛盾，仅将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文化冲突，成为资本危机治理的政治缓冲机制。

3.2 “虚假人民”的政治操控与意识形态再生产

民粹主义打着“人民”旗号进行政治操控与意识形态再生产。其宣称的“人民”非真实社会主体，而是被政治修辞符号化的“虚构共同体”。Ernesto Laclau 在《On Populist Reason》中指出，民粹主义通过 symbolic linkage 与情感动员塑造“empty signifier”的空洞人民主体，利用“反精英”“反体制”叙事凝聚社会不满情绪，为统治阶层重建政治合法性。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认为，这种“伪人民性”掩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将阶级压迫伪装成民族、文化或身份认同冲突。民粹主义以情感诉求取代理性批判，以“国家利益”名义削弱工人阶级国际团结，妨碍社会底层对资本逻辑的根本反思，使人民政治主体性被掏空，沦为权力操纵工具，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统治形态^[4]。

3.3 民粹主义与全球治理失序的互动机制

民粹主义与全球治理失序形成复杂双向互动。一方面，民粹政治削弱国际制度协调能力与全球合作基础，其拒绝国际组织权威、否定 multilateralism 与全球规则，秉持“国家优先”主张，加剧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与分裂。另一

方面,全球治理失效为民粹主义提供社会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在推进全球化时忽视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群体利益,导致财富分配失衡。Joseph Stiglitz 在《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指出,全球化不平等使“被遗忘的群体”成为民粹政治支持者,其通过民粹话语表达对全球秩序的不满。民粹主义强化“反全球化”“反精英”叙事,削减国际合作与制度信任,形成治理失序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内在矛盾:既需开放与合作维系资本扩张,又被 nationalism 与保护主义破坏。这种结构性困境表明,民粹主义非资本主义危机的“解药”,而是其延续与掩饰的政治表现。

4 重构全球治理的人民观路径

4.1 以人民主体性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的激烈碰撞中,民粹主义的蔓延深刻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力失衡与资本垄断困境。这一矛盾的本质在于,现有治理框架未能真正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反而被资本利益与霸权政治所绑架。要化解这一危机,必须将人民主体性置于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重塑其价值根基与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里的“人民”并非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具体的历史主体——他们既是气候变化中受极端天气威胁的农民与沿海居民,是公共卫生危机中缺乏疫苗与医疗资源的弱势群体,也是粮食安全链条中因国际资本投机而陷入贫困的农民。全球治理的转型需以这些真实的社会主体为出发点,将公平、共享、合作确立为核心原则。例如,在气候治理领域,发达国家应兑现资金承诺,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技术转型,而非通过“碳边境税”等单边措施转嫁危机;在公共卫生领域,需建立疫苗专利池与技术转让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救治权。这种转型要求国际制度从资本主导的“排他性规则”转向包容性规则,赋予小国、弱国更充分的议题设置权与决策参与权,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投票权分配机制,增加非洲、拉美国家的代表性^[5]。

人民主体性的确立,本质上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当前全球治理中,跨国资本通过游说集团与离岸金融中心主导规则制定,导致国际贸易协定偏向资本利益,劳动者权益与环境标准被边缘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需构建“社会-生态”双重底线标准,将就业保障、收入分配、生态保护纳入国际规则评估体系。例如,在电子商务协定谈判中,应平衡数字巨头利益与中小微企业生存空间,防

止“数字殖民主义”;在投资仲裁机制改革中,需限制跨国公司通过“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条款威胁国家公共政策主权。只有当全球治理从“资本增值工具”回归“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者”,才能打破民粹主义将矛盾简化为“民族VS外来者”的叙事陷阱。

4.2 构建基于多极共治的全球秩序

民粹主义对“国家优先”的极端化推崇,实质是旧有霸权体系合法性危机的产物。单极世界中,强权政治通过干预主权国家内政、滥用单边制裁维持霸权,导致国际合作信任基础崩塌。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观强调,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建立在平等、互利、互信的“多极共治”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6]。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实践蓝图。其核心在于以人民福祉为导向,构建“共赢-包容-互补”的新型国际关系。例如,“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资本垄断的“中心-外围”分工体系,实现自主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将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发展议程”重新置于国际合作核心,回应了被民粹主义利用的“被遗忘群体”诉求。这种模式与民粹主义的排他性形成鲜明对比:当极右翼政党煽动反移民情绪时,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落实;当单边主义撕裂多边贸易体系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通过差异化义务设定,实现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利益整合^[7]。

多极共治的实现需要文化价值层面的共识重塑。民粹主义通过制造“文明冲突”叙事分裂世界,而多极共治强调文明对话与制度互信。例如,上合组织通过安全合作与人文交流“双轮驱动”,在反恐、能源、教育领域形成多元合作模式;中非合作论坛将政府援助、企业投资、民间交往相结合,打破“援助-依赖”的陈旧框架。未来需进一步推动国际法体系的“去中心化”改革,如建立多边数字治理平台,协调欧盟《数字市场法》、中国《数据安全法》与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诉求;在气候补偿机制中,引入“历史责任+支付能力”的差异化出资原则,替代西方主导的“碳俱乐部”模式^[8]。

这一秩序转型将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公正、开放、平衡的方向演进。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考虑特别提款权(SDR)的普遍分配,当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逐步恢复运转,当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中发出更强声音,多极共治正从理念转化为实践。它不仅意味着国际权力结构的调整,更标志着全球治理从“霸权护持逻辑”

向“人类共同利益逻辑”的范式跃迁——而这正是抵御民粹主义诱惑、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路径。

5 结语

民粹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产物，在意识形态层面呈现资本主义矛盾的伪装，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倒退。以人民观分析，可揭示其“以人民之名异化人民”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强调人民的历史主体性，反对将人民符号化、工具化。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才能重构全球治理的正当性与道义性。未来全球治理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核心，以公正、包容、合作为原则，实现真正的“人民全球化”。唯有如此，全球治理方能摆脱民粹主义的短视逻辑，迈向理性、平等、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 [1] 付舒. 谁在支持特朗普：实证分析美国民粹主义[J]. 国际政治科学, 2024,9(04):73-107.
 - [2] 林红. 在社会与国家之间：欧洲政党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变量[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4,(06):76-84.
 - [3] 张若楠. 俄国民粹主义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及启示[J]. 西部学刊, 2024,(21):41-48.
 - [4] 王淑佳.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特征、风险衍生及引导策略[J]. 湖北社会科学, 2024,(11):39-48.
 - [5] 杨宏雨.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审视——基于核心资料的解读[J]. 学术界, 2024,(10):164-180.
 - [6] 谢辉元. 社会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观念的递嬗[J]. 人文杂志, 2018,(05):7-14.
 - [7] Shiro Armstrong.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Potential of East Asia's RCEP Agreement[J]. East Asian Economic Review, 2022,(01):3-25.
 - [8] Sudipta Bose. Climate-linked compensation, societal values, and climate change impact: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23,(05):759-785.
- 课题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困境研究（项目编号：19YJC8100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西方民粹主义思潮的新动向及其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024BKS170）。
- 作者简介：朱梅莹（1982.10-），女，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